

# 《志愿军：存亡之战》：再现集体记忆的“三观”整合叙事

陶冶



▲《志愿军：存亡之战》将宏大叙事彻底背景化，而将细腻的笔触聚焦于以李默尹、李想和李晓一家人具体的战斗故事中，从而激起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



近年来一系列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重大主题电影作品，例如《金刚川》和《长津湖》系列等，越来越倾向于将宏大的战争作为呈现人物个体战斗的背景，在审美过程中制造观众对人物性格与命运的“异质同构”，进而螺旋式地实现英雄们对当下观众的感染。

与上述两部影片不同的是，《志愿军》系列在创作思想上有着极其不可思议的颠覆性。

该系列影片的第一部《志愿军：雄兵出击》，以全景式的创作方式，再现了这场新中国“立国之战”的发生直至松骨峰战役的几乎全过程，其未及预期的票房成绩，也引发了人们重新探讨“宏大叙事”是否真的在当下的媒介语境中过时的话题。

然而到了该系列第二部《志愿军：存亡之战》的时候，创作思想几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该片将宏大叙事彻底背景化，而将细腻的笔触聚焦于李默尹、李想和李晓一家人具体的战斗故事中，从而激起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

## 点滴记忆汇聚到宏大叙事的河流中

毫无疑问，基于这场新中国“立国之战”而创作的文艺作品不仅数量上早已汗牛充栋，而且在体裁上几乎实现了对所有文艺形式的全覆盖，对于战斗英雄的歌颂同时也在激励着每一位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这些有限的内容资源迅速地经典化，从而成为建构“共和国情感”的集体记忆，经历了时代的洗礼与沉淀，随着我们代代相传的书写与叙事绵延至今。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于1925年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他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尽管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由人们构成的集合体中存续着，并且从其基础中汲取力量，但也只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才进行记忆”。在此我们需要强调的是，首先集体记忆不是脱离个体记忆存在的，它必然是一种民众个体记忆被社会化后的最大公约数；其次集体记忆只有经过不断“延续”方才能实现自我的建构。因而，不论什么民族，亦毋论来自何方，建构其民族认同或国家认同的内在心理机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一个人共同

的“集体记忆”。而我们理由相信，作为民族“个体记忆”最大公约数的这种情感，也一定在最终会抽离出最根本、最真挚的人类共同情感。

对《志愿军》系列电影的创作者们而言，浩如烟海的档案、史料、回忆录、口述史，以及前述深入人心的文艺作品，全都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集体记忆的点点滴滴——正如成为我们集体记忆的“出兵与否的痛苦抉择”“彭德怀只身入朝”等诸多事迹，以及“毛岸英烈士遇难”“38军万岁”等战斗事迹，其实某种意义上都是彼此割裂的独立故事。如何将这你我所熟知的“点点滴滴”汇聚到抗美援朝这一宏大叙事的“河流”中，反而成为了一项巨大的挑战。故而该系列电影的第一部《志愿军：雄兵出击》竭尽所能地以一种网状叙事结构，将这些碎片编织在一起，从而为第二部《志愿军：存亡之战》奠定了叙事和基础。

## 三层叙事策略编织革命历史叙事网络

为使这些集体记忆的碎片能够有机地整合到一起，创作者们将整个《志愿军》系列电影的叙事策略总体分为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

微观战斗层面包括一系列的战场细节与真情实感，因此片中营指导员李想、

副连长孙醒、翻译李晓、武器专家吴本正、通讯员（伤亡记录员）杨三弟等虚构或半虚构的角色反而成了串联战斗现场的线索。他们来回穿梭在各个战场上，使得我们表面熟悉陌生的英雄被编织进抗美援朝战争这张叙事的大网里，彼此因战争的逻辑而建立起了联系，从此不再孤立。

在中观战争层面则是以彭德怀、邓华、洪学智、韩先楚等为代表的志愿军司令部为叙事核心，不仅串联起各支部队的战斗事迹与五次战役的指挥得失，而且38军夜行140华里血战松骨峰、63军面对两倍于己的敌人打出的铁原保卫战等战争故事，都经过了志愿军司令部的肯定后才得以传扬。同时，志愿军司令部还向上连接着远在北京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换言之，如果说一线指战员面对的是具体的战斗，那么志愿军司令部则是在进行着基于军事思维的通盘思考，而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则在菊香书屋里进行着国家战略的运筹帷幄。

最后是宏观战略层面，这一层面的战略叙事不仅聚焦于毛泽东的菊香书屋，而且还将视野拓展到相应的外交战线，莫斯科、华盛顿、联合国的交锋与中南海决策的胶着，对应着超越战争之外的全球战略，更使得《志愿军》系列电影具备了我国之前“宏大叙事”所罕有的全球视野。

于是，在这个三层叙事策略中，碎片化的民族集体记忆被罗织进这张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叙事网络中，各自得以发

扬，而又相得益彰。

此时，彭德怀和毛岸英这两个角色在重要性在这一叙事体系中便显得极为重要——前者连接了宏观战略与中观战争层面的理性叙事，而后者则在情感上串联起上至毛泽东下至通讯员杨三弟之间的朴素情感，从而贯穿了三个层面的叙事线索。更重要的是，毛岸英烈士很长一段时间是作为一个符号化的集体记忆而沉淀于本民族心理的，如何让当下的观众在有限的篇幅中认可这一人物的行为与动机，其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本片的创作者们别出心裁地让虚构的李氏一家人建构起观众可以共情的家庭，并由李默尹担任中央军委参谋以连接宏观与中观的叙事，甚至下到一线部队参与微观叙事。而其子女李想和李晓则不仅在战斗一线见证历史现场，也因寻父的动因，而串联起中观与宏观两个叙事层面。

## 一把钥匙承载银幕内外的共同体

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以朝鲜战争中的关键战役——铁原阻击战为叙事核心，深刻描绘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3军在数量和装备上的绝对劣势时，凭借坚定的抵抗意志和出色的战术策略，成功地阻止了联合国军队的猛烈攻势，对战争的最终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联合国军”反攻铁原的有四个师近五万人，而面临受命的第63军仅有2.5万名将士，更不用说双方的武器装备水平的天差地别。这不仅在军事史册上标志着一场显著的胜利，更深刻地彰显了志愿军战士们的坚毅与勇敢，也毫无疑问地点出了影片“存亡之战”的核心命题。

影片的制作团队投入大量精力进行历史资料的挖掘和现场考察，力图在服装、道具、布景等细节上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实，以此提升影片的历史真实感和视觉冲击力。据悉，全体剧组人员，从置景开始到拍摄，耗时三个月奋战“铁原”，打造超20万平米的铁原阻击战置景，超过上万人加入万米战壕的搭建工作，真实还原了“铁在烧”的激战场面。

也正是在中国电影高度工业化的今天，创作者们可以借助更加艺术化的电影创作手法，重现了这场关键战役的残酷与悲壮，进而使观众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背景和深远影响；也可以让观众通过沉浸式体验银幕上志愿军战士们的浴血奋战，以及战争的无情和战士们的英勇，激战十二昼夜，成功抵挡住了敌军步步炮火的数次冲锋，最终理解我们的前辈是如何迫使对手重返谈判桌的。

在影片中，李家三口是与今日观众实现情感异质同构的代入体。这个战争中的小家竭力呵护的钥匙，不仅是一个象征物，它还承载着家庭的联系和记忆。这把钥匙在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中就已经被巧妙地设置为一个细节，

顺延至《存亡之战》，它不仅象征着家的温暖 and 安全感，也代表了家人之间的深厚情感和牵挂。钥匙的存在提醒着影片中当时的人们和影片外今天的观众，无论身处何地，都有一个家在等待他们的归来，那不仅仅是一个避风港，更是家人的爱和思念的寄托。

这个家庭在战火纷飞中难得的团聚，彼此拥抱带来的温暖，以及那一瞬间被照片永恒记录，都构成了刻骨铭心的回忆，更是代表了战场上无数家庭的共同期待和心愿。甚至，李晓在作为翻译向美军进行广播的时候，都奉劝他们“go home（回家）”，从而贯通了全人类的共同情感。顺着这个“家”的情感逻辑，当看到志愿军战士们高呼着各自的家乡冲向敌人时，不禁让人感叹这一处情节设计的精妙。毫无疑问，无论战场上的他们抑或是银幕前的我们源自哪个省份或城市，共同代表的是伟大的祖国。

应该看到，中国电影近年来无论在艺术创作上，还是在制作技术上，都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高质量发展。只是我们在探讨中国电影的高质量发展时，永不能满足地追求更高质量的发展。这种对精益求精永无止境追求，难道不是正是影片中牺牲的“最可爱的人”留给我们血脉中最重要的基因吗？让我们真诚地期待《志愿军》系列电影的下一部。

（作者为暨南大学艺术学院/珠江电影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 《浴火之路》：打拐题材影片的新突破

赵建中

今年国庆档的电影市场强片如林，市场竞争激烈。而在其中，以打拐为题材的影片《浴火之路》最终位列档期票房第二，可谓一匹黑马。该片能够在众多作品中突出重围，离不开直面现实的勇气。

恩格斯在给哈克奈斯的信中指出：“您的小说，除了它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以外，最使我注意的是它表现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就是要求艺术家有社会责任感和勇气，勇于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

《浴火之路》将拐卖儿童这一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搬上银幕，并以犀利的笔触进行表现，展现受害者家人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坚韧意志，向全社会发出了对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零容忍的呼吁，就是这种“真正艺术家的勇气”的体现。

而更进一步，是影片“爆裂打拐”的叙事风格及与之相呼应的物象形象的设计，为观众带来新的观影体验。而且，影片虽然在“爆裂打拐”下足功夫，但却没有止步于单纯的“爽片”逻辑，而是在人物与故事的冷峻的呈现中不失人性的暖意。正如同名主题曲所唱的那样，“爱与正义是永恒的星光”。商业片如何在现实题材的立意深度与观赏性上做出平衡？《浴火之路》为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 以“爆裂打拐”叙事风格，探索艺术表现的新突破

打拐题材历来是电影人关注的领域。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陈可辛执导的影片《亲爱的》与彭三源编剧

并执导的影片《失孤》。这两部分别上映于2014年和2015年的影片，共同特点是“以情动人”，着重表现被拐卖孩子父母对孩子的思念，以及他们的悲痛、焦灼与绝望的心情。而《浴火之路》的表现风格则不同。可以说，该片之所以受到广泛的关注，就在于不落以往同类影片的窠臼，在艺术表现上有新突破，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观影体验。

首先，《浴火之路》影片摒弃了同类题材影片惯用的悲情叙事手法，而是表现被拐卖孩子父母的绝地反击。影片角色没有以往作为弱势群体的怯懦，不是被动等待命运的裁决，而是挺身而出，成为保护孩子、对抗邪恶势力的战士。他们以孤注一掷、玉石俱焚的勇气、激情与病魔在荒蛮之地打拐，其动作之激烈，场面之火爆，无不让观众感到痛快淋漓，热血沸腾，影片整体表现呈现出“爽片”的风格。很难想象，一部聚焦拐卖儿童的悲情题材的电影竟然给观众提供了如此酣畅的观感。

其次，《浴火之路》将多种类型片的审美元素融为一体。影片一开始就如悬疑片，笼罩着一股神秘的氛围，人物性格与剧情走向充满不确定性。接着是三位主角驾驶车辆穿越黄土漫漫、峭壁林立的无人区与荒山野岭的边境，路上的景象呈现出西部片中的粗犷美感。而影片中原为警校刑侦格斗教官的赵子山与崔大路，人贩子有多场打拐戏，其动作设计之精彩，出拳之稳准狠，不亚于很多动作片。

此外，该片虽然是一部现实题材的影片，但是在艺术表现上具有魔幻片的“超现实”风格，比如一只兔子从天而降；丧尽天良，连自己的女儿与妻子都敢买的陆永安在得意忘形时被炸雷劈



《浴火之路》剧照

死等等。这些场景对剧情的推进及观众的情感宣泄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浴火之路》的配乐对影片氛围的营造也有所助益。多首歌曲的歌词、旋律与影片画面相得益彰，为影片增色不少，尤其是片尾由童声演唱的歌曲《宝贝回家》表达了人们“愿天下无拐，盼宝贝回家”的愿望，旋律纯净而哀伤，直击人心，令人动容。

## 以对人物形象的精心设计，赋予影片较高的完成度

《浴火之路》在美学风格上的大胆突破，离不开与之相呼应的物象形象的设计与演绎。《浴火之路》在初次官宣时的中文片名是《虎狼之路》，英文名

是Tiger(老虎)、Wolf(狼)、Rabbit(兔子)三个片名，讲述了三位失去孩子的父母因命运的交织而结盟，共同踏上充满凶险的复仇之旅的故事。正是由于对人物的精心设计与演绎，《浴火之路》有了较高的完成度。

影片中，肖央、刘烨、赵丽颖三人分别饰演失去孩子的父母，对应虎、狼、兔三种不同动物。

肖央饰演的“虎”——崔大路，西装配寸头，痞气十足，浑身散发出粗野与凶狠的气息，就如一只凶猛的老虎。他对拐卖团伙毫不留情，将一管芥末全挤到塑料袋里，然后直接套上人贩子的头，表情决绝，动作干脆。这一角色的设定，是以最原始的怒火为千千万万个受害者“出口恶气”，同时也表明了社会大众对拐卖犯罪的零容忍态度。此外，

影片还赋予崔大路粗犷外表下的铁汉柔情，表现了他与女主角的细腻情感，其收放自如的演绎让人眼前一亮。

刘烨饰演的赵子山在影片中对应的动物是狼，代表的是被拐卖孩子父母中那些拒绝屈服命运、用勇气与智慧与邪恶势力进行较量的父母。在影片中，赵子山以充满怒火的眼神、乱糟糟的头发、黝黑的皮肤、一件脏兮兮的旧皮衣示人。由于孩子被人贩子害死，他对人贩子的恨意远比崔大路、李红樱更深。但就是这么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狠人，很多时候却沉默寡言，情绪低落，每天“活得像鬼一样”，直到遇见崔大路与李红樱，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重生之路”。

赵丽颖饰演的李红樱外柔内刚，看似柔弱的兔子，但在保护孩子时却奋不顾身，坚定狠辣，彰显了母爱的力量与伟大，它足以跨越生死，对抗世间一切苦难。赵丽颖的戏大多多是内心戏，表演难度较高，但她出色地演绎出了角色从无助、绝望到坚韧、决绝的精神状态，展现出角色在柔弱的外表里隐藏着的坚强灵魂。

该片编导通过“虎狼兔”的组合，展现了惊心动魄的打拐过程，传递出人们对光明与正义的向往。此外，这“打拐三人组”的默契配合，联手出击，宛如江湖侠客除暴安良，快意恩仇，令人叫绝。正是该片编导与演员对人物的精心设计、演绎与影片“爆裂打拐”的美学风格紧密呼应，使得《浴火之路》作为一部商业片，无论是在主题立意还是在艺术表现上都完成度较高，有较强的观赏性。

应指出的是，虽然《浴火之路》是国庆档的热门影片，但是并非一片叫好声，这也与影片存在的缺憾有关。这具体表现在：崔大路与赵丽颖都是寻找孩

子，按常理，找孩子就是还有将生活好好活下去的愿望，因此就不可能毫无底线，坑蒙拐骗什么都干；再者，崔大路丢孩子的理由很荒谬，自己在楼上相亲，孩子在马路踢球时被人贩子拐走，但是影片没有表现出他因为自己没有照顾好孩子的内疚与自责心理。李红樱与陆永安这样的烂人纠缠很久，在社会底层打滚，干过仙人跳，经历与内心世界复杂，但饰演者赵丽颖的清纯气质却与之有所偏差；再者，李红樱被前夫威胁、压榨，也知道是前夫卖掉孩子，但为何并不报警，影片没有给出理由。

影片或许是为了增强爽感，于是就给反派人物强行降智，比如随便什么地方来了两个人说要给老金儿子介绍对象，老金这个老奸巨猾、心狠手辣的大人贩子没有调查这两个来客与照片中女子的来历，一看女子相貌就定下这一姻缘。还有，赵子山和崔大路假意与老金做生意，于是顺利见到老金；正巧老金儿子出来玩，小叶子也随之出来；正巧小叶子一低头，又露出了胎记，这一切过于巧合，缺乏说服力。

总的来说，《浴火之路》以其对社会问题的敏锐洞察、生动的角色刻画以及艺术表现风格的独创性，不仅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更以警醒与教育意义触动人心。正因如此，该片上演后，很快就赢得了观众的良好口碑，这些口碑之中，很多是对电影主创人员的社会责任感和对艺术创作不懈探索的认可。正如影片所说，世界上被拐孩子能被找回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三，期待中国电影人这曲“爆裂打拐”的壮歌，能够以文艺作品的独特力量对不法分子产生震慑，促使“天下无拐”的美好愿景早日实现。